

从《货殖列传》谈司马迁的动态经济思想

柴啸森,陈新岗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济南 250100)

摘要:近年来,关于《货殖列传》中经济思想的研究并不在少数,但长期以来存在的两个问题制约了研究的深入。一是国内学者奉西方经济理论为圭臬,存在从《货殖列传》中摘取部分语句,机械对应近代西方经济学说思想的现象;二是研究视野拘泥于《货殖列传》本身,忽视了其与《史记》其他章节的有机联系,将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贡献浅薄化。司马迁经济思想之要旨所反映在《货殖列传》中的部分在于肯定了宏观经济间的相关关系,并加以动态分析,在此之上才有了其对市场机制的肯定,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司马迁;《货殖列传》;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4-0032-06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设立《货殖列传》与《平准书》开创了我国史学界设立经济专篇的先河,后世史书中大多设有《食货志》以专述经济史。与《平准书》只记述西汉武帝时期平准均输政策这一具体经济事实不同,《货殖列传》以地理和人物为脉络,描绘了有史以降的经济面貌,为司马迁动态经济思想的考察提供了更为直观的素材。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显著特点是以探讨人性为出发点,将逐利性作为人类活动的驱使力量,而在普遍性的逐利性驱使下,又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地呈现出不同的行为选择,这些行为分析均是以详实明确的史料基础作为支撑的。

一、《货殖列传》的地位探讨

《货殖列传》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它反映了司马迁对经济行为的态度。《货殖列传》共计4778字,在共计52万余字的《史记》中所占比重不低;若与5420字的《平准书》共计,则整本《史记》中专门记述社会经济的篇目已超过一万字,这种体量足以体现作者对经济活动的重视程度,比而观之,整本《史记》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微观层面的个人财富增长予以了足够的重视。可以说,在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大行其道的封建

社会,《货殖列传》的篇目安排是开创性的。

《货殖列传》的重要性其次体现在它反映了司马迁对人的经济属性的理解。司马迁首作《货殖列传》,以“货殖”这一行为作为立传的标目,首先反映出其对经济活动的重视与其对人理解的进步性——社会群体中的人并不仅仅是依照身份地位而划分的政治个体存在,同样具有经济属性,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独立个体。在《太史公自序》中,《货殖列传》的引言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1]3319},认为不妨害政令与百姓的获利行为是可以借鉴的,这表达了对自发形成的商品经济的肯定与认同。

《货殖列传》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反映了司马迁对经济活动的重视程度。“货殖”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先进篇》“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中,此处的“货殖”所指仅为子贡所从事的交换买卖行业,并包含囤积投机、猜测行情的批评意味^{[2]122}。在《货殖列传》中,出现的人物多达31名,遍布农业、牧业、渔业、矿业、冶铁业、盐业等多个行业的经营范围,至此,在史学记录中,“货殖”这一概念同样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虽由来已久,但在司马迁之前时

收稿日期:2022-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机制研究”(20XZW003)

作者简介:柴啸森(1998—),男,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新岗(1975—),男,山东潍坊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山东大学信用研究中心主任。

代的认知当中,经济活动仅作为政治秩序的附属产物,由此,史书的形制也无外乎编年体和国别体两类,而编年体史书亦以一国年表大事作为串联线索进行编修,依然是政治本位的。以经济为脉络的史料记录独立成篇,则说明在司马迁的认知体系当中,经济活动是关乎社会流转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二、司马迁的思想渊源

(一) 司马迁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自认系传说时代颛顼帝史官重黎氏后人,而重黎氏族人于东周时代逐渐淡出了官方史官的行列,直到司马谈担任太史公才重持祖业,因此,司马迁在与壶遂的问答中多次引用司马谈的言论,以修史为己任,甚至甘愿忍辱著书,与其父担任太史公的家学熏陶不无关系,“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1]3295}。《史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司马谈的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3295},其成书同样离不开司马谈担任史官期间的准备工作。“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1]3319} 司马谈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该文系司马谈对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思想的总结。

分科治学的专门化经济学科是缘起于西方的治学理念,其科目化专门化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学界进入近代社会前所不具备的。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治学目的始终是寻求治世的办法,其内容虽杂糅经济、礼仪、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但始终围绕政治学的中心展开,认为诸多手段不过是治世的工具,这也决定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不会出现细化明确的具体科目。如同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所总结诸子百家观点时的结论,“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不同学派的观点根本出发点还是为了国家富强、达成治世而展开的,不过是周全与否的分别。同时,司马谈认可阴阳家顺应四时的理念,“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1]3290},又尤其推崇道家思想,《论六家要旨》着重论述又收束于道家要旨,又对道家只有肯定没有否定,认为在人类活动之上存在着天道这种自然律法,而不论是个体还是国家所需要做的都是顺应道的律法而行动,因此,司马谈认为名家的长处在于认识具体问题之时究其根本,“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1]3291},而应摒弃困于概念而失真的弊端,“苛察缴绕,使

人不得反其意”^{[1]3291}。

面对具体的社会经济,司马谈肯定墨家思想能够通过强本节用使百姓达到“人给家足”,但同样批评说“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俭而难遵”是直接的批评,那“不可遍循”的批评程度则更甚,原因在于司马谈认为墨家的理念将导致尊卑无序的出现,“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1]3290-3291},这与其认可儒家的尊卑礼仪观念是分不开的。儒家思想中的尊卑之别并不提供了道德层面的指导与判断,而且还体现在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关系中,为不同社会个体经济地位的合理性问题提供了答案。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司马氏父子全然认可儒家观念划定的分配秩序,但起码说明在其认知体系之中,分配秩序是需要存在的,且这种社会秩序必然需要情感因素作用于其中,因此,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3291}同样不可取。“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1]3291}。

(二) 司马迁的游学经历

司马迁之生平经历的叙述,主要来源于《太史公自序》。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称自己生于黄河龙门耕读之家,十岁开始诵读古文,二十岁辞家南游。以此观之,司马迁的开蒙教育应当是以古文儒家史籍为基础,而非其父所倾向的道家思想,这正与司马谈的宦游经历对应,司马谈入京任太史令时并未要司马迁跟从,而是安排其在家乡耕读。有研究者认为依唐代司马贞的说法,司马迁应出自伏生门下,这种说法因为二者的年龄差异巨大而并不可信。同时,《儒林列传》中司马迁并未有自身受教于伏生的记载,司马迁事伏生当首出司马贞言论。司马贞系唐人,其素隐不必全然信服,且伏生保存古文《尚书》,司马迁自幼即学古文《尚书》,亦受到伏生影响,但并不能说明他必亲自师从伏生。无论如何,儒生思想定然对司马迁的思想形成影响颇大,不论是童年经历还是日后的长年交游,均为如此。

二十岁后司马迁遵父命游历南北,其行迹北起龙门,西至长安,南达沅湘,东临齐鲁,后经梁楚返回,这使得司马迁对汉初以来的经济现状与政策效果有了一定的认识。虽然不同学者对其游历路径尚有争议,但仅就《史记》篇目内容来看,其经历地点确实无疑。同时,《孔子世家》中司马迁丝毫不避讳自己对孔子的仰慕,“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1]1947},并给予“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1]1947}的赞誉,亦提及行经鲁地习儒礼的见闻,“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1]3293},况且,前代学者包括老庄在内均收入列传且多为合传,篇幅亦不及《孔子世家》,足以见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敬与认可。多年的游历经历使得司马迁得以考察各地民俗,如其在薛地发觉民风彪悍,而将原因归结为孟尝君在此养士吸引奸人入薛而形成此般特殊风气。这些不见于书的特殊史料,同样为《史记》的撰写提供了启发,也为其在《货殖列传》中系统总结各地不同的民风提供了支持。

三、《货殖列传》中动态经济思想脉络

(一) 司马迁对人性的认识

《货殖列传》的开篇引用了《道德经》第八十章的内容,并对这种小国寡民的治国理念进行了批评。但是,作者的批评并不是对道家思想完全的否定,只是意在说明小国寡民的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下社会的需要。甚至作者对小国寡民理念的批判也是在发现了《道德经》中存在一个难以消解的逻辑缺陷基础上而开展的:作者推崇的“故善者因之……最下者与之争”^{[1]3253}的治国理念和谈及汉初经济现状时给出的“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1]3254}的评价具有浓厚的老子思想色彩,与《道德经》第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如出一辙。

具体而言,司马迁对人性的分析是以历史事实为来源和依据的,在“太史公曰”后提出:有记载的史料反映出人有史以来的行为都是追求声色犬马口腹之欲的餍足,这种风俗由来已久,哪怕是老子的教化也不能从根本上进行改变。既然不能改变,那么最好的方式便是因势利导,运用这种原生行为进行国家的整体治理。这段论述首先提出了人性逐利本质是由来已久、可以得到史实证明的,进而从人性的本质入手,不仅解释了作者对小国寡民批判的原因是小国寡民违背了人性,而且在逐利本质基础上对国家治理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因势利导才是最高明的策略。而后,为了证明因势利导的可执行性,又对作为具体案例的现实状况进行了描绘:我国在历史上就地大物博,不同地理区域的资源禀赋状况是不同的,尤其是深山远境存在着众多中原人民所需要的产品,于是在逐利本质的指引下,人民竭尽其所能满足自我需要,这反而达成了人民安居乐业、产业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而这种自发行为并不是在国家政令

的督导下进行的。在这一基础上,司马迁又对各行各业人群的行为动机作了分析,如贤人、隐士、商贾、士卒、闾巷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等,得出了“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1]3271}的结论。这种对人性的论断构成了对整体经济分析的基础,人的行为活动构成了社会的经济流动,只有对人类活动有了定性的认识,整体分析框架才得以构建。

(二) 宏观经济的微观决定

对于个体间财富的差异,司马迁认为,这是由个体的智慧所决定的,“巧者有余,拙者不足”^{[1]3255},并以姜太公与管仲治齐作为案例——齐国多盐碱地又人口稀少,是传统意义上不适农耕区,也被认为是不利发展的地域,姜太公与管仲则因势利导发展渔盐纺织,实现国家强盛的同时也赚取了个人财富。这一认识除了肯定了个体逐利本性外,还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并没有绝对的不利形势,在看似不利的形势下,一样可以凭借个体的聪明才智实现产业发展与个人富足。同样的案例在文中还有范蠡将治国的计然之策用于治家,并特意引用了白圭对智、勇、仁、强在求富中的作用的论述。同时,文末又总结了“富者必用奇胜”^{[1]3282}的结论,认为哪怕是贱业或薄利行业一样能有巨富出现,这自然是由于使用个人智慧而能出奇致富了。

在司马迁看来,不同行业在致富方面具有天然差异性,即“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1]3274},这是从致富效率上来论证的,并且提出:评判行业是否利于致富的标准在于盈利是否能达到本金的五分之一。这一标准的制定依然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司马迁将高利贷认为是合理正当行业^[3],在大都市做生意的掇客收取佣金的标准便是“贪贾三之,廉贾五之”^{[1]3274},因此,如果不能达到五分之一(年利息20%)的标准,便不被认为是好的致富行业。对于工农商业致富效率的高低,作者并没有详细解释,仅仅是基于对现实状况而作出的总结。当然,解释其中原因也并不是一个史学家所必须的任务,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不同行业回报周期不同:务农一年一次回报且无法拔苗助长;从事工业制作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用于生产,或许可以通过加大劳动力投入缩短生产时间,却无法从根本上剔除生产耗时;而商业则仅仅是买入卖出、借入借出的商品与资本流通过程或通过“倚市门”形式直

接将劳动者服务商品化,类似今天所言第三产业的营收过程,回报周期较前两者更快,这是由于行业性质而天然形成的,因而形成了“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局面。这一结论需要应对的挑战是,如果行业真的存在天然的差异,为什么还会出现行业分工,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社会道德对不同行业的评价:“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1]3272},凭借劳动力获得财富(务农)是符合道德标准而受到社会褒扬的,故而在社会上又呈现出“以未致财,用本守之”^{[1]3281}的风尚,也就形成了行业分工的基础。

地域间的贫富差距更为复杂,其原因兼具了物理区位的因素与人文社会的因素。如解释关中地区经济发达的原因,司马迁指明关中人民喜好农事。关中地区首先是土地肥沃,具备了发展农事的物质基础,其次在于先王遗风中劝慰农事的习惯得以保留,因此关中地区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关中雍邑和长安地区逐渐成为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吸引了大量的人口与资源迁入,加剧了人地矛盾,促成了商业的发展。同时,关中地区又处于不同经济区位的联结地区,不同种质的商品得以交换,这不仅使得关中地区赚取了天下十分有六的财富,又影响了周边地区的民俗与经济地位。而齐国在区位上的劣势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因而,纵使有姜太公与管仲这样的能人利用智慧扭转不利局势,也只能使得齐国富甲一方,而不能像关中地区一样富甲天下,这是由于区域间存在的固有不同而决定的。司马迁还观察到了南北地区的差异,楚越地区人民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足以依靠渔耕实现自给自足,因而没有从事商业贸易的需求,形成整体生活水平偏低但较为平均的势态,而北方地区则由于水旱灾害频繁导致对于劳动和储藏有着更大程度的需求,反而较之江南地区更为富足。

(三) 宏微观经济的动态交互

《货殖列传》中经济思想的高瞻远瞩,尤其体现在对宏微观经济动态交互问题的认识上,这种交互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体的逐利行为促进了整体宏观经济的发展;二是宏观经济状况又对个体的微观经济行为产生影响。

微观经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非由司马迁首次发现,在其引用的《周书》之中,已经存在这种动态的全局的分析概念,即“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

少”^{[1]3255},而司马迁比周书更为进步的一点在于其后的“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1]3255}一句。这一点认识完成了经济循环发展的逻辑闭环:百姓安居乐业便能为社会创造各种所需要的产品,使得社会财富获得增加,而增加的财富又可以用于新一轮的生产,由此形成一个完整又可持续的经济周期;反之,财富缺少则无法开展进一步的生产,那么经济发展自然要倒退了。这一推演并不是纯粹始于逻辑而终于逻辑的,相反,是司马迁在观察到了大量例证后得出的结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计然之策。长期以来,计然之策被认为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这一认识略显浅薄,甚至和司马迁“因势利导”的主旨相背离。与其说计然之策是国家干预经济,不如说是视国家为市场经济中的又一独立主体,遵循市场规律而采取的实现国家与国民双赢的经济行为。计然作为越王谋士,其首要任务自然是实现政府收益的增长,对此,计然给出的策略是国家依照价格周期从事不同的商品交易。计然已经观察到商品的价格会呈现出周期波动的情形,也分析出其原因在于不同天时和地域条件下民众对不同商品的需求不同,这为国家作为大商人参与市场交换获利提供了条件。同时,交换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是生产和市场机制的存在,因此国家在参与市场经济时必须兼顾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和促成了市场交换的商人的利益,通过增减政府交易量将价格控制在二者均有利可图的范围内,这为经济周期的可循环提供了保证,也是国家能够在市场机制下持续获利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经济周期得以周转的动力,依然是缘于人本能中天生所具有的逐利行为,而逐利行为又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不断满足个人财富增长需要,又能增加社会财富积累,这种类似于“道”的经济发展过程,便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同样,宏观的经济基础条件又会对微观的人类活动产生影响,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社会风气,二为行业选择,二者互为表里。举例而言,三河(河东、河内与河南)地区是传统的农耕区,虽人地矛盾尖锐,却也形成了节俭世故的民风;而三晋地区不利农耕,商业活动繁荣,形成了剽悍的民风,这一地区的人们并不为从事盗墓、抢劫、造假、娼优等职业感到羞耻。这都是社会经济对个人价值影响的体现,这种经济基础决定社会风气与主要产业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能得到例证。归纳而言,便是司马迁所引用的《管子》中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3255}的思想。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需求后便会出现更高的道德需求,这并没有背离人性中逐利的本质,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逐利行为,即所逐之利不再仅限于财货,而是包含了对名利的追逐,又因为这种追求美好名声的需求才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那么逐利行为,也应当得到认可。

四、司马迁动态经济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司马迁动态经济思想的东方性

不同于西方专门化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司马迁在修史时观察到了经济中动态联系的现象,并没有就此归纳出学理化、规范化的具体理论,而是着重论述如何因势利导地顺应并利用这种联系以实现国家富强、百姓富足的治世理想。这种片段化的论述虽然难以形成完备的体系,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学者没有相应的经济思想,反而证明,较之西方学者,我国学者更早地对经济社会中的部分规律有了认识与思考。西方经济学视亚当·斯密为开山鼻祖,其在“理性人”假设、“看不见的手”理论、分工与专门化、市场定价机制上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司马迁对人性的逐利本质的定性、肯定宏观层面经济的联结与互相决定作用以及关于政府职能的讨论都与其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4]。只不过,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与规律,斯密工作的重心在于以学理化、规范化的语言对其进行提炼,而司马迁探讨的核心目的始终是面对这种现象与规律时,国家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实现国富民强的根本目标。

西方经济学家热衷于构建纷繁冗杂的数理模型,认为可以通过不断完善的模型假设构建现实世界在模型中的映射,于是不得不经历从局部到整体的分析过程,而常常短于立足整体视角观察并解释社会经济的运转状况。这一短板是可以通过东方性的思维方式予以补足的。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构建是目标导向、历史导向的,并不囿于解释原理、传导机制等技术性问题,而是通过历史的经验来证明归纳经济规律,并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治国政策。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内部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问题始终无法通过西方经济学的模型分析框架做出服众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学术研究和具体社会经济的割裂性。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言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5]《货殖列传》中反映出的极具东方特色的动态经济思想,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以期对我国经济建设提供更多的启发。

(二)司马迁动态经济思想的借鉴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学界在对我国经济周期的论述中频频提及“国进民退”一词,而司马迁的动态经济思想则将个人致富与国家致富看成一个统一的问题,认为从根本上看,国家与民众是一体的,国家财富增长的根源不应当是对民众财富的侵夺,也不应当是仅仅通过某个行业单一发展,而应当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不鼓励民众进入各行各业之中。同时,政府以市场主体身份而不是市场监控者的身份,参与到市场交易活动中去,以此达到政府收入增长和控制物价水平的目的,这样一来又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2021年中央经济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6]等要求,而这恰好与司马迁动态经济思想有相通之处。微观层面有利可图,市场主体活力便能够被激发。宏观政策的稳健有效也与微观政策的协同互通不可分离。而结构层面的国民经济循环也是建立在各经济主体协调工作的基础上的。

当然,司马迁经济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具有时代局限性的内容,需要辩证看待,但这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警示。例如,司马迁对待资本运作的态度是暧昧甚至支持的,这一基于在仓廩实而知礼节逻辑推理的认识认可了资本剥削。司马迁的个人认识构成中,光耀门楣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而“素封”群体通过生息资本而不从事生产劳动便实现钟鸣鼎食的奢靡生活被认为是可取的方式。资本通过循环赚取超额利润实现剥削而造成社会的贫富分化是在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普遍存在的现象,这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对资本的特性和运行规律有所把握,对此,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10]司马迁反对国家对商人群体的控制,认可高利贷行业的存在,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资本运作固然促

进了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但纯粹的市场机制与资本运作同样会造成不合理不公正的分配秩序,造成贫富分化,长远来看并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司马迁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强大力量,这一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同样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规范资本运作,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孙洪升,宋一森.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J].思想战线,2016(1).

[4]屈晓娟.司马迁与亚当·斯密经济思想比较研究[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21).

[5]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EB/OL].(2018-08-23)[2021-12-10].<https://cpc.people.com.cn/n1/2018/0823/c64094-30245212.html>.

[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1-12-11(1).

Sima Qian's Dynamic Economic Thoughts in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Merchants*

CHAI Xiaosen, CHEN Xingang

(School of Econom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n the economic thoughts in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Merchants*, but for a long time, two problems have restricted the in-depth study. One is that domestic scholars take Western economic theories as the standard, and some sentences in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Merchants* are extracted and mechanically correspond to the modern Western economic theory. The other is that the research vision sticks to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Merchant* itself, ignoring its organic connection with other chapters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downplaying the contribution of Sima Qian's economic thoughts. The gist of Sima Qian's economic thoughts reflected in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Merchants* lies in affirm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cro-economy and micro-economy, and analyzing it dynamically, on which he affirms the market mechanism. This is still instructive for today'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ima Qian;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Merchants*; economic thoughts

(责任编辑 陇 右)